

系統批判右派言論講座論文集之一

湖南肅反運動的伟大成就 不容抹煞

李 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系統批判右派言論講座論文集之一

湖南肅反運動的成就不容抹煞

李 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年·長沙

編号：(湘)0972

系統批判右派言論講座論文集之一

湖南肃反运动的偉大成就不可抹煞

著者：李 强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号)

长沙市新街路

印刷者：湖南印刷厂

长沙市蔡锷中路

发行者：新华书店湖南分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16

字数：14,000

1958年6月第一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统一书号：3109·35

定价：(5)七分

32
L3

出版說明

我們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在政治戰線上、思想戰線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右派分子已經被完全擊潰了。但是，對右派分子所散布的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還遠沒有肅清，必須長期地深入地細緻地進行批判。

中共湖南省委整風領導小組與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為了這個目的，在1958年3月至4月，組織省級機關的一些負責同志，向省直屬機關和長沙市的機關幹部做了七個報告，比較集中而又系統地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各種謬論。這七個報告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必須加強黨的領導；湖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領導；民主與專政、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關於農村中兩條道路的鬥爭；湖南肅反運動的成就不容抹煞；在文化教育與知識分子問題上駁斥右派。現在，我們將這些報告全部加以整理，公開出版。總名為“系統批判右派言論講座論文集”。這一套小叢書的出版，對廣大幹部、職工、學生分清大是大非，提高理論認識，以及今後學習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將是重要的參考材料。

編者 1958年4月

目 录

- 一、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英明措施……………(2)
- 二、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績……………(5)
- 三、必須正确地分析和严肃地对待缺点和錯誤……………(9)
- 四、党的領導是肃反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証……………(15)
- 五、肃反斗争必須实行群众路綫……………(17)
- 六、为彻底、全部、干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而斗争……………(20)

1957年春天，湖南和全国各地一样，资产阶级右派在肃反問題上，向党、向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造謠誣蔑，說“肃反运动搞糟了，没有什么成績可言”，說党领导肃反运动是“胆大包天，党政不分”，等等。资产阶级右派的这种进攻，由于全国人民的奋起反击，已被完全击潰了。他們的各種謬論，也已經被駁倒了。但是，这个斗争是在各个單位、各个战綫分散进行的，为了使大家了解肃反斗争的全面情况，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在肃反問題上坚决駁斥资产阶级右派的謬論，現將湖南肃反运动的情况介紹如下。

一、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正确的英明措施

从1955年7月开始，到1957年年底为止，經過兩年多的緊張斗争，湖南已有49万人参加了肃反运动。肃反实践的結果証明，开展这样一次广泛的、深刻的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为了說明这一点，我想有必要回忆一下肃反运动以前阶级斗争的情况。

大家知道，肃反运动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夕开始的。

在这以前，我們在社会上进行了偉大的鎮反运动，扫除了一大批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但是还有不小的一批公开暴露的反革命沒有肃清，至于暗藏在內部的反革命則还远沒有肃清，他們仍在不断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当时，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随着美帝国主义对新战争的加紧准备和对我国进行顛复破坏活动的加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日益发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不仅沒有緩和，沒有减少，而且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反革命破坏的特点是：搞反革命宣傳，搞反革命組織，搞反革命武裝，进行凶杀、暗害、縱火、張貼反动标語，以及阴谋組織暴乱，企图推翻人民政权。他們的經常活动則主要是拉攏和利用各种落后的、不滿的分子，扩大矛盾，制造混乱，达到消极怠工和破坏的目的。1955年春季，在凤凰、江永兩县的边缘地区相繼发现了“中国革命党殷难部队四省边区指揮部”“富(鐘)、永(明)、江(华)軍团司令部”两个反革命組織，阴谋組織大規模的暴乱，因我們偵察及时，在敌人行动前即予全部破获。与此同时，在湖南的中心地帶，也破获了不少有組織的反革命案件，如望城县破获的“湖南人民反共救国总部”，曾搜罗武器，調查干部、积极分子的名單，阴谋进行暗害。在这一时期，美蔣特务机关也加紧派遣特务，进行情报和所謂“敌后建党”、“心理作战”等顛复活动。例如，蔣帮“国家安全局”曾派遣特务設法打入国家机关內部，搜集重要情报。蔣党“中委会”在湖南布置潜伏的“湘鄂边区工运聯絡組”和“湘南青运工作組”，曾积极发展組織，搜集情报，并企图在重大节日散发反动傳單，进行煽动破坏。反革命对社会主义的阴谋破坏，极其明显地反映了当时階級斗争的尖銳，表明了我們与反革命的斗争，是一

場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必須看到，階級斗争这种尖銳的情况，在我們革命內部必然会有反映。这是因为解放以来，由于我們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們靠攏，其中魚龙混杂，泥沙俱下，反革命分子乘机钻了进来，从內部进行破坏。1955年上半年在湖南厂矿、企业单位发生了不少反革命破坏事故，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同时期內，在厂矿、企业、机关內部，連續破获了“中国农民党”、“中国人民兴中党”、“和平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自由党”、“中国力行学社”等反革命組織。資兴煤矿破获的逃亡反革命集团，有的伪装积极，当上了生产組長、工区主任、保卫干部。其中一个名叫呂凤仪的，是一个血債累累、罪惡严重的反革命分子。他伪装积极，假报成績，騙得了劳动模范的榮譽，混进了共产党內，参加了首都国庆观礼。衡阳汽車保养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国良，縱火燒毀油庫，自己也跳入火中燒死。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怀着如此强烈的階級仇恨，甚至抱着同归于尽的瘋狂态度来破坏我們。这些事实，充分說明在我們內部确实暗藏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的活動是十分猖獗的。如果不发动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不能保証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安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順利进行。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在全国範圍內及时而又坚决地发动了肃反运动，这是完全正确的、英明的。現在肃反运动的結果已經充分証明肃反运动是絕對必要的。資产階級右派說肃反沒有必要，肃反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这很明显是反对我們的肃反运动，反对无产阶级專政。他們企图把反革命保存下来，以便实现他們主張的地主、資产階級的專政，使反革命势力复辟。这是我們和右派分子在肃反問題上

的根本分歧。这是根本不可調和的矛盾。在这个問題上，誰如果站不穩立場，分不清大是大非，那么，他就一定要犯严重的錯誤，以至掉到右派的泥坑里去。

二、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績

湖南肃反运动的成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查出了4,023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这里面有132名是有現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有12名是美蔣特务机关派遣进来和解放前夕有計劃布置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也有不少是血債累累、民憤很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有一些是流氓成性、一貫为非作歹的坏分子和政治騙子。运动中还繳获了軍用无綫电发話发报机一部，收話收报机三部，机枪一挺，長短枪51支，子彈2,743发，手榴彈15枚，以及大量反动証件。通过运动把这一批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对巩固我們的党，巩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安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清查出二千余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这里所講的普通反革命，是同肃反中定案处理的反革命分子比較起来說的。因为他們反革命罪行輕微一些，有的在肃反以前还曾作过一些交代，因此在定案处理的时候，按照中央內部肃反的政策界限，有意識地放寬了尺度，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但从性質上說，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三青团分队長，国民党軍隊中有一般罪惡活动的連長以下的軍官，反动会道門坛主以及日伪政权的有一般罪惡活动的乡長等。除此而外，还发现了

一批重大反革命嫌疑分子，揭露和处理了 150 个反动的小集团，清查出 30 名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反动小集团的被摧毁，各种反动分子的面貌被揭露，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受到尖锐的批判，就大大地扫除了机关内部的歪风邪气，加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政治空气浓厚了，劳动纪律加强了，各种事故减少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例如衡阳專署鹽业公司，肃反前政治空气淡薄，肃反后，1956 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单位。株洲機車車輛修理厂 1956 年肃反后比 1955 年事故减少了 65 %。

第三、由于在肃反运动中充分发动了群众，深入地宣传了肃反政策，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加之在内部肃反的同时，在社会上也开展了深刻的镇反斗争，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反革命内部的分化和瓦解。在肃反运动中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约占总数的 70 %。因而有利于摧垮暗藏反革命势力，加速了运动的进程。

第四、弄清了许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在运动中交代政治历史问题的有 7 万人。其中有一小部分由于隐瞒了较为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而列为肃反清查对象进行审查，经过运动已经给这些人作了正确的结论。弄清了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组织上对他们有了更清楚、更全面的了解，便于更好地培养、教育和使用他们，同时，也使他们放下了长久背着的历史包袱，靠攏了组织，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这对革命事业以及对他们自己都是有利的。

第五、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干部，提高了领导。通过运动的深入发动和实际的敌我斗争，使全体人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增强了识别反

革命分子的能力。我們充分地发动了群众，特别是发动了那些暂时处在中間和落后状态的群众，使他們划清了敌我界限，积极参加了肃反斗争。全省进行揭发检举的共92,124人，检举反革命、坏分子的材料共11万余件。全省肃反专职干部絕大多数在斗争中立場坚定，发动群众同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学习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培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经过肃反斗争，也进一步認識了麻痹思想和忽視政治的严重危害，从而提高了警惕，严密了制度，改进了领导。

上述五个方面的收获，說明湖南的肃反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偉大的运动，它的成績是巨大的，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经过肃反运动，已經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右派分子說：“肃反一团糟，成績等于零。”显然是別有用心的。十分明显，如果不把这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出来，我們就会处在相当数量的暗藏反革命的經常威胁之下，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随时遭到他們的突然襲击而造成重大的損失。这里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在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部分已混入了共产党內，混入了共青团內，有的已騙取了模范、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有的已窃取了科長以上的领导职务。他們隱蔽得如此巧妙，長期騙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如果不在現在識破他們的真面目，那么，在長远的將來，他們将会爬的更高，給革命造成的損失也会更大。仅就这次資產階級右派猖狂进攻的情况說明，如果沒有进行肃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然会乘机破坏，給我們以严重的襲击。肃反运动的偉大作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作了肯定的

評價。毛主席說：“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有些動蕩，但是沒有引起什麼風浪，這是什麼原因呢？應該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我們在肅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無疑是我們國家鞏固的重要原因之一。”右派分子企圖否定肅反運動的偉大成就，正是因為他們不願我們的國家得到鞏固。

右派分子還說：“歷史反革命不能算反革命分子，他們不交代自己的問題只是思想問題。沒有現行活動就不能算反革命。”這顯然是為反革命作辯護。在肅反中，查出的歷史反革命都是暗藏的有罪惡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按反革命論處，那是群眾所不允許的。他們長期隱瞞了反革命歷史和罪行，改頭換面，隱藏在我們內部，顯然不是什麼“思想問題”。雖然，他們暫時潛伏未動，但是又有什麼根據證明他們已經洗心革面，不會進行破壞了呢？他們這樣隱瞞真相，經過多次號召、教育，仍拒不坦白交代，這就至少也證明他們是無異於定時炸彈。我們當然不能因為炸彈還沒爆炸就否認它是炸彈呀。必須指出，查出的歷史反革命當中，不少一部分罪惡嚴重，民憤極大，不清查出來嚴肅處理，就不足以平民憤，就不能徹底解放群眾。湘潭市查出的反革命分子王敬，1930年在廣東普寧縣任偽縣長時，圍剿我普寧革命根據地，燒毀民房700餘間，殺害我普寧縣縣委委員林乙申等革命同志及群眾19人。岳陽縣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方民冤是一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被他殺害的幹部和群眾達50餘人。華容縣查出的反革命分子雍容，1930年至1931年任華容縣第六區清剿委員時，殺害了革命幹部、紅軍戰士9人，湘鄂邊區主席謝爽成同志也是被他捕捉殺害的。這些反革命分子難道不應該按反革命論處嗎？

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也有一些同志对肃反产生过一种錯誤的看法。他們說：“肃反在全省或一个地区可以說成績是主要的，我們这个單位就不一定。”这种看法主要出現在沒有查出反革命分子的單位。有的人怀疑：“既然我們这里沒有反革命，为什么也要来个肃反运动呢？”他們不了解那个單位有 沒有 反革命，只是通过肃反的实践，才能得到証明的道理，更沒有認識到肃反是一場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須經過肃反运动使每个国家工作人員受到教育和鍛煉的重要意义。某些單位沒有查出反革命有兩種可能：或者是漏掉了反革命，或者是那里根本沒有反革命。这些單位成績是否主要的，應該实事求是地分析。如果在这些單位經過肃反，把人員的政治情况弄清楚了，群众受到了教育，又沒有发生严重的錯誤，就應該說成績是主要的。

三、必須正确地分析和严肃地对待 缺点和錯誤

我們对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錯誤，从来就是严肃的、認真的，檢查分析也是全面的。如何檢查分析，得有一个标准。我們的标准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因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是解决敌我矛盾的艰巨斗争，能否彻底肃清反革命，这是第一位的問題，运动中的某些缺点、錯誤，只是第二位的問題。根据这一标准檢查我省的肃反工作，我們認為：湖南肃反成績是主要的，发展也是健康的。但在运动的不同阶段，

也发生过两种不同的缺点和錯誤：一方面是“左”的缺点和錯誤，另一方面是右的缺点和錯誤。

“左”的缺点和錯誤主要发生在 1955 年秋季第一批肃反运动的高潮时期，時間大約半个月左右，由于我們主观方面缺乏經驗，备准不足，某些地方审查控制也不够严格，加上客观上斗争十分艰巨复杂，因而在这批运动的小組斗争中，斗争面宽了一点，斗錯了极少数的好人。在斗争方法上，少数單位的个别小組，也出現过打人、罵人的現象。对这种錯誤我們发现得比較及时，糾正得也很坚决。在捕人問題上，也錯捕了极少数的好人。这种錯誤，給运动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并在少数群众中产生过对肃反工作的若干怀疑。对于这些缺点和錯誤，我們采取了严肃認真的态度坚决糾正，并没有因为是个别的少数人的問題而加以忽視。我們进行了許多善后工作，对錯斗、錯捕的好人，向他們誠懇地进行了賠礼道歉，当众恢复了他們的名譽。对于那些有政治历史問題而被当作反革命斗争的人，也作了許多解釋工作。因而基本上消除了某些副作用，巩固了肃反的成果。

肃反工作中右的錯誤，主要是在运动后期，由于存在着右傾思想和松勁情緒，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在处理上也存在着該捕不捕，該判不判，重罪輕判的錯誤。少数右傾思想严重的同志，只看見“左”的方面的錯誤，看不到右的方面的錯誤。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时，采取了放縱、寬容甚至开脫的态度。縱容反革命分子，把反革命漏掉，一时似乎看不出影响，实际上却埋藏着极大的危險，就好象在我們身旁安置了定时炸彈一样，随时都可能給我們以突然的严重的伤害。

应当指出：無論是“左”的或右的錯誤，就整個運動來說，只是暫時的、局部的，是完全可以糾正或彌補的，而且大部分我們已經作了糾正，有的正在檢查和糾正中。因此，肅反運動應該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缺點是次要的，運動的發展也是健康的”。右派分子說這是“教條”，是“公式”，我們說這是事實，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公式，經過群眾的大辯論，已經證明這個“公式”是正確的。

右派分子曾經抓住我們“左”的方面的錯誤，加以渲染夸大，攻擊肅反。這裡要提出的是湖南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杜邁之，他處處強調肅反出了大偏差，否定肅反的成績，在知識分子中大肆污蔑，說什麼“肅反把知識分子的榮譽、尊嚴掃倒了，智慧、良心受到損害，令人寒心”。這很明显是別有用心的挑撥。共產黨向來就是重視知識分子的，把他們看作國家的一項寶貴財富。廣大的知識分子經過各項社會改革運動，有了很大的提高和進步，但是，在知識分子隊伍中，確實暗藏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全省在大專學校、中學和完小查出的反革命、壞分子有967名，占總人數的1.4%。只有把他們清查出來，純潔知識分子隊伍，才能適應迅速發展的建設事業的需要。對於經過審查不是反革命的人，我們認真進行了善後工作，已經基本上消除了隔閡。縱使現在還有極少數人有些隔閡，當他們確實懂得了肅反重要意義以後，隔閡也是會消除的。他們的問題弄清了，更有利於教育、培養和使用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杜邁之利用肅反問題煽動某些知識分子對黨不滿，陰謀與黨爭奪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權，居心是十分險惡的。

這裡還必須提到原湖南師範專科學校教員嚴怪愚的問題。

他在省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攻击肃反搞错了，是“胆大妄为，一手遮天”的把头作风。他表白自己干净，对革命忠诚。事实上，他1927年加入共青团，马日事变后就自动写了“悔过书”，向反动派自首。1928年混入了共产党，随即又叛了党，不但参加了国民党，而且还参加了复兴社，担任了国民党第16师特别党部少校宣传干事，在湘西一带追击我们长征北上的红军。以后，担任反动报纸的编辑，写了很多反共文章进行反共宣传。解放后，与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彭燕郊大肆宣传胡风的反动文艺路线，反对党对湖南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运动中他的态度抗拒，声言要在浪涛中挺起身子，不栽倒下去。虽然如此，我们仍采取极为慎重的调查研究的态度，群众也并没有斗争他。现在他反而攻击肃反搞错了，岂不是有意污蔑吗？

在大鸣大放期间，在杜迈之、严怪愚之流的煽动和影响下，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抓住肃反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兴风作浪，大哭大闹，曾经一时闹得乌烟瘴气。这里，我们重温一下列宁的教导是会有益处的。列宁1918年10月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仅敌人而且我们的朋友也常常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负起了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了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自然就难免犯许多错误，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就最引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而不愿深入研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国有些人抓住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误，大哭大闹。……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的工作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说：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当我们读到列

宁这一段話的时候，对杜迈之、严怪愚之流的丑惡嘴臉不是看得更清楚了嗎？

湖南医学院右派分子刘果平、刘自源攻击肃反扩大化了，說党中央1955年对內部敌情的5%左右的估計，是扩大化的根源。在革命队伍中間也有的同志对这一点認識不清，甚至盲目附和。必須严正駁斥右派这种謬論，批判各种錯誤思想。

应当明确，敌情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对敌情估計的高低与衡量敌情的政策标准是相联的，而政策标准又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而有宽严之分。在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行將到来的前夜，反革命活动十分嚣张，我們党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是着重严的方面。在运动初期，确定肃反清查对象参照实行了社会鎮反的政策界限，目的是为了打垮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到了1956年春天，三大改造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革命势力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敌人已經开始分化和瓦解。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們党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又有意識地放寬了一些，对反革命分子的解釋，則完全按照內部肃反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进行。例如，現在所說的普通反革命，在社会鎮反时都是按反革命分子論处的，而在1956年春內部肃反的政策界限实行以后，就不按反革命論处了。还有在肃反运动以前作了交代，但未作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只要他們沒有严重的罪惡，也不按反革命論处了。这是一种寬大的措施。但是从性質上說，这些人仍然是反革命。湖南第一批肃反运动查出反革命和坏分子601名，查出普通反革命和其它反动分子432名，兩項合計1,033名，占这批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2%，加上肃反运动中社会鎮反从这些單位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肃反前已基本交代但未作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分